CHINA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
（普及读物）

抗战时期的难民

孙瑜魁 著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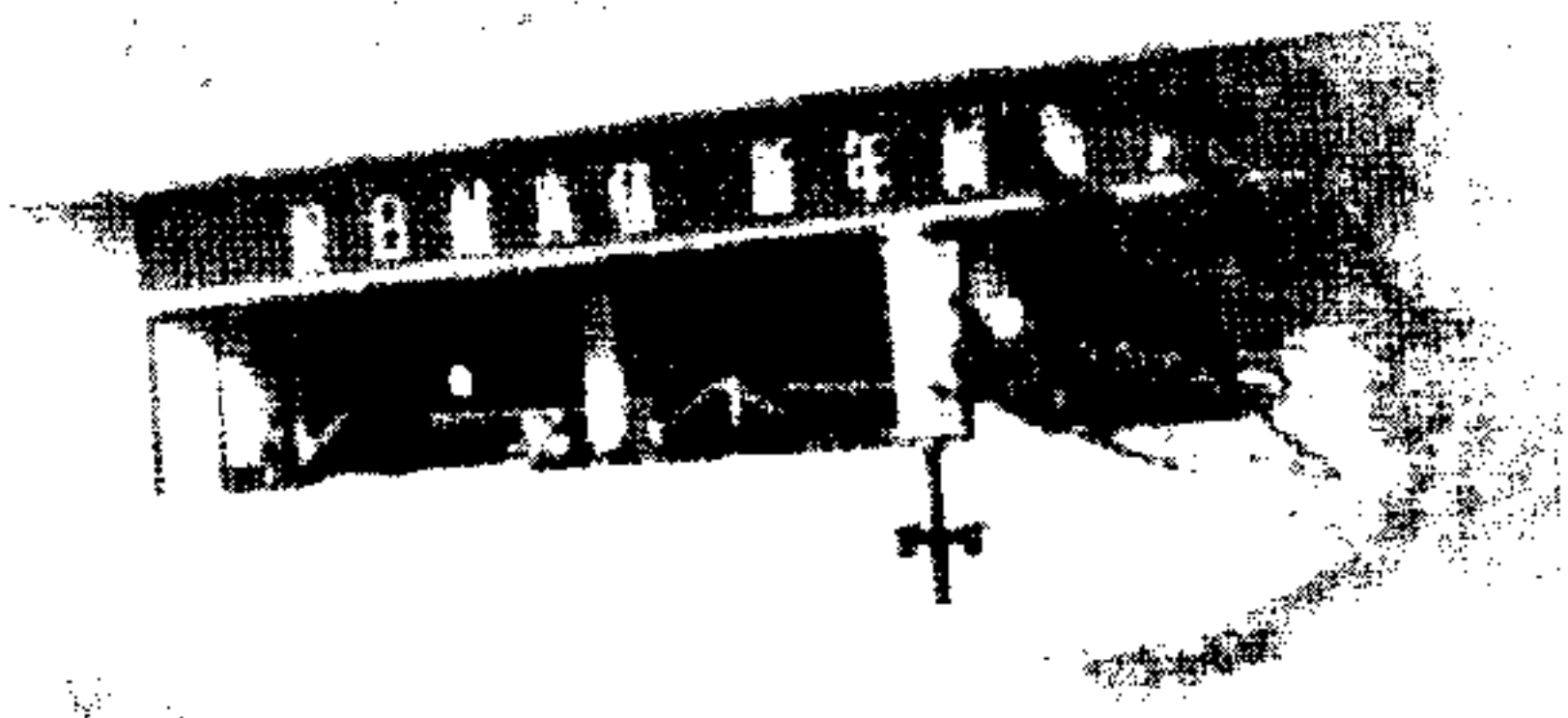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

（普及读物）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普及读物)

编 委 会

顾　　问：龙新民　徐锡安　蒋效愚　林文游　兰宏生
名誉主编：白介夫
主　　编：刘述礼　夏　强　张建东　张承钧
副 主 编：董柏林　魏永旺　于延俊　齐密云　要秋霞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淇　王汝丰　王桧林　孔宪东　庄建平
何　理　张　量　张兆民　张注洪　张丽丹
李　蓉　李良志　李仲明　李宗远　罗焕章
林治波　胡大庆　荣维木　贺新城　徐博东
徐　勇　章伯锋

CHINA

不应忘却(代序)

我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幸存者,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侵华日军烧杀掠夺的罪恶行径。如今距抗日战争胜利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现在的青年一代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成长和生活的,他们没有对苦难历程的切身体验,更无法感受做亡国奴的痛苦,因此人们总有些担心,惟恐他们会在对历史的浑然不知中,忘却中国曾经经历的屈辱和苦难,忘却先辈们为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日本曾经是中国最谦卑的学生,可是近百年来,却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从1874年首次侵略祖国宝岛台湾开始,连续几十年,没有间断过对中国的侵略,到1937年,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积贫积弱的中国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蹂躏。但是中国人民没有气馁,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倾其所有,用最无畏的精神和气概,把侵略者赶出了家门、国门。如果没有团结,没有艰苦的奋斗,没有发自内心的自信,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今天再回首这段历史,我的心中依然感慨万千。在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国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精神。青年人是国家的栋梁,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未来。他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吸取教训。

数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同志一直有个强烈愿望,那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最真实

CHINA

的事件勾画一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画卷，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记取历史。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来自多方面的关怀与帮助，这套中国抗战史通俗读本终于问世。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对于参予写作和出版的个人和单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将会给人们留下更多的启迪，尤其是青年人。

白介夫

二〇〇一年九月

（白介夫同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原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顾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抗战时期的难民

孙艳魁　著

CHINA

CHINA



无家可归的难民



难民购票逃亡时的拥挤场面



医护人员为被炸伤的难童治疗

CHINA



在难民收容所里吃饭的难民



前往难民收容所服务的工作人员



重庆难童教养院中的难童

CHINA

目　　录

一、为什么流浪 …… (1)
二、民族苦难 …… (3)
三、庞大的群体 …… (6)
四、流浪远方 …… (9)
五、难民的人员构成 …… (12)
六、流亡的苦难 …… (16)
七、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 …… (20)
八、社会各界的难民救济 …… (23)
九、敌后根据地的难民工作 …… (26)
十、对难童的关怀 …… (30)
十一、后方的日子 …… (34)
十二、抗战胜利与难民回乡 …… (3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一、为什么流浪

在不少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影片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当日本侵略军向我国的城镇、乡村气势汹汹地发起进攻之际，成百上千的我国无辜民众纷纷四处逃避。于是，在与敌军进犯方向相反的道路上，慌恐的人们蜂拥而来，扶老携幼，呼儿唤女，拎着或背着大小包袱，脸上满是愤怒、紧张和疲惫的神情，还有人不时回头张望……这就是难民。

难民现象可以说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而战争则是造成难民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战争就会有难民。就战争的一般规律而言，战争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哪里就会出现大批难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八年，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损害，这个时期的难民问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民族的苦难之一。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领土被大片大片地霸占，中国人民被成千上万地屠戮，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他们中许多人不得不告别和平的生活而背井离乡，沦为难民。在日本侵略者闪闪发光的刺刀下，手无寸铁的他们有工不能做，有田不能种，正常生活已不能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故土虽然难离，但生命更加重要；何况在异族的蹂躏下所受的屈辱

和苦难更非大多数人所能忍受，离开故乡或多或少还有报效国家民族的机会。可以说，背井离乡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可以这样说，逃亡的难民是日本侵略军带给战区乃至全中国的普通民众最直接、最普遍的“礼物”。

CHINA

二、民族苦难

日本野兽惨无人道的杀戮、抢掠、奸淫，使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从战争一开始，战区许多民众便不得不沦为难民，许多乡镇几乎成为空城。

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写道：平津失陷后，天津小小的英国租界的街道上拥挤着 50 万以上的难民。[①]这些人都是从周围城镇涌入英租界的。据 1938 年《满铁调查月报》的统计，当时华北的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 50％左右。平汉铁路沿线的河北邯郸，由于战争和战争造成的饥荒，县城原有的 1.6 万居民中有六七千人逃亡，保定城的 8.6 万名居民中，半数以上的人因为激烈的战争而逃往外地。[②]

中国最重要城市之一的上海，在“八一三”战火燃起的当天，就至少有六万人逃入租界避难。[③]通往租界的外白渡桥上，难民“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被压在地上的呼救声，呼儿唤女的悲啼声——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了，满路尽是遗弃物”。[④]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战时来到租界避难的中国人至少有 70 万。[⑤]不仅如此，截至 9 月 30 日，从上海一带逃回苏北的难民有近 30 万人，[⑥]逃往浙江的难民人数恐怕也不下此数。

山东也是战争初期的主要战场之一，这里民众也因为战争而大量逃亡。据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 1939 年 12 月

CHINA

的调查：省城“济南在事变前，有四十余万人口；当事变时，仅有万余人，大多逃避一空”。⑦可见日军对民众威胁之大和民众逃亡之普遍。

华南重镇广州居民沦为难民的也很多。该地在战争爆发时有居民150余万人，到1938年6月8日，路透社报道说：“现仅有50余万人。”⑧这其中除一部分人疏散回乡外，相当一部分人流亡去了内地的大城市。

在广大的乡镇和农村，难民现象也极为普遍。台儿庄战役时，当地居民大部逃往运河南岸的苏北一带，一部分逃往抱犊崮山区，只有少数老人守在家里。战役告一段落后就有部分年轻难民从苏北及山区回来打探消息，接着逃难的人也逐渐回来了。⑨在河南北部的乡村大量居民也逃往外地，直到八路军来了之后才逐渐返回。例如“温陟水田区的柴庄，只有六个人在家过年，八路军来了以后，逃亡回来的人已增加到三百口。一区八万人，减至三万九千，八路军来了以后，又回增到六万”。⑩这些情况都说明难民现象即使是农村在抗战初期也是十分普遍的。

抗战中后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有日军的侵略就必然会有难民产生。例如山东临朐县1940年时有人口38万，从1940－1942年因为日伪、土匪的烧杀抢掠和大旱，该县成为骇人听闻的无人区。1942年全县仅剩下八万人，大部分都逃往了外地。⑪抗战末期的1945年4月，日军在湖南做垂死挣扎，进攻湘西。在经过武冈的青背塘村时，该村的村民都逃到村外高山岭的岩洞里，整整躲避了四五十天，直到日军败走才敢回村。⑫

CHINA

① （美）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第91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② 《满铁调查月报》(1938年7月)，第92、113页。

③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 梅益等著：《上海一日》第2部，第15－16页，上海美商华美出版公司1939年版。

⑤ 陆佳编：《沦陷区域同胞的惨状》第一辑，上海抗战出版社1938年版。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65案卷。

⑦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山东庶政视察团”第五组：《视察山东庶政秘情》(1939年12月)。

⑧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10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⑨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7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⑩刘备耕编：《沁滇血花》，第35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⑪ 路遥：《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三省初探》，《人口学刊》1985年第6期。

⑫ 萧致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第8－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CHINA

三、庞大的群体

抗战时期到底有多少无辜中国人沦为难民呢?

这是每个关心难民问题的人想知道的，也是每个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想知道的。但是，要弄清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人做过估计（因为这个问题不可能有非常精确的数字，也因为统计标准不同而造成出入，所以只能是估计）。其中有1938年5月刘南溟先生在《新民族》周刊上撰文估计为3000万以上；桂林版《大公报》1944年估计为8000万；1946年版《中华年鉴》估计为4000万等等，但都根据不充分。

国民政府主管难民救济的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也公布过一个统计数字：从1938年4月到1944年12月底，该会共救济难民“四千九百零一万四千八百九十二人”。[①]但这个数字也不是精确的。因为这个数字只是人次而不是人数；在时间上也不完整；还没有将不需要救济或未曾得到救济的难民考虑进去。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难民人数的统计，但它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八年抗战中的难民人数绝对是必须以千万为统计单位的，这个时期的难民绝对是一个人数众多、构成复杂的群体。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有学者经过研究提出，抗战时期的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